



汉语俗语的文学图像

Hanyu Suyu de Wenxue Tuxiang

沈玮◎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汉语俗语的文学图像

沈 玮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俗语的文学图像/沈玮著.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10. 11

ISBN 978-7-5100-2825-0

I. ①汉… II. ①沈… III. ①汉语—俗语—研究 IV. ①H13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93172 号

本书获“上海交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科研出版基金资助”

汉语俗语的文学图像

著 者: 沈 玮

责任编辑: 王晓燕

封面设计: 春天书装图文设计工作室

出 版: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发 行: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北京朝内大街 137 号 邮编: 100010 电话: 64077922)

销 售: 各地新华书店和外文书店

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5.75

字 数: 245 千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100-2825-0/H · 1159

定 价: 2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沈玮的专著力图用交叉学科文艺民俗学的知识理论,对汉语俗语特有的文学性和图像性作一新的透视和缕析。

“文艺民俗学”作为文艺新学科的研究领域,是为了能在当代全球化浪潮中,用现代意识、多元化文化眼光、交叉学科理念,对于一国固有文艺和文化的关系进行更全面深入的研究和应用,从而认清文化多元化语境下中国文艺的本土本色,以便进一步更好地推动中国文化在世界的传播。多元文化的发现和发展是当代全球化现代化进程中,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文化的多元化是指各民族大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依旧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和精神特质,并在全球化中汲取营养,实现自身的创新与发展。一个国家经济文化包括文艺的发展,从来都是依附在民族固有的、一定的精神文化的基础上实现的。一国固有的文化,如同潜在的河床,总是规范着一国文艺的走向。因此不同的文艺从来总是有相对应的本民族的思想文化基础。由此而言,文艺是文化的产物,文艺本身也是一定多元文化的展演。汉语俗语的文学图像化特征,也是多元文化中独特中华文化的文学化语言的结晶。

自人类问世以来,记录和传递人类文明的文化符号,一度聚集于各类文字的表达。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发现,相伴于人类进化的文化符号还有行为和图像等其他形态,特别是图像。一个人生活在人间一天24小时,对事物的认识 and 信息的交流,不少是非文字的图像、影像的传送和思维,尤其是进入当今多媒体的“读图”时代,形象化的图像思维更为发展。然而传统的文字思维和图像思维并不是对立的,实际上,两者的内在是衔接在一起的,本专著研究的问题与这两者也有关联。

有着三千多年古老象形文字原形的汉字,是世界上独立发展至今还具有生命力的图像文字。

汉字与民俗有着天然的血缘联系。我国学者曲彦斌对此早有相关的认识。他在所著的《中国民俗语言学》中,已经为语言学和民俗学的结合提出



了独特的学理构建。他把两者交叉定义为民俗语言学：“以民俗语言和民俗语言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或可谓之民俗语言文化学。具体说，民俗语言学是综合运用语言学、民俗学及其他相关方法、材料，对语言、言语与社会习俗惯制等民间文化现象相互密切联系的形态（即民俗语言文化形态）、性质、规律、机制、源流等，进行双向、多方位考察研究，从而给予科学解释并指导应用的人文科学。”

的确，这个定义的提出为语言学和民俗学的结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框架体系，充分地包括了民俗学和语言学可以关联的各个方面。但是，汉字与民俗的关联不仅仅在于此。

汉字的原型大抵是在神州大地汉民族先民原始民俗——活世态生活相形象描摹表意中发生的，是汉民族先民习以为常的生活相图像的形象化写照。在人们长期的生存实践中，反复出现的模式化的生活事项和言行，相沿成习，积习成俗，俗定成图，图定成字。所以，以象形文字为基本构架和形态特征的汉语在历史长河中，与以表音为主的拉丁文如英语一类有所不同。其文字的形成、词汇的组合、言语的交流、修辞的应用、语法的构成等等方面，受到了更多更强烈的固有民俗的制约和影响。同时，汉字及其组合成的汉语也具有了由民俗固有内涵构成的天然的形象图像，为汉语俗语的文学图像奠定了先天的基础。

汉语俗语则是这一形态中的典型的范式：俗语本身是一定习俗文化表现的形象写照。它一般不用文艺常见的艺术加工和刻意雕琢，而只需以人们日常口语中极其简约的鲜活字眼，就能勾勒出人们生活中一幅幅栩栩如生的人生风俗画与文学图像化的语境和场景。汉语俗语与文艺及民俗文化的天然关系，显现了形象化的文学语言与文化图像的特征，有助于对汉语俗语建立全新的文学性认识，并且对于当代文艺创作的手段和民俗文化象征的理解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过去对汉语俗语的研究，绝大多数还停留在语言学层面，从其文学性、文化性着手的综合研究为数不多，能把其语言、文学、民俗文化三方面的特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新的视角对汉语俗语进行全方位考察的研究还没有。本书将作出首次尝试，体现其语言学、文艺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组合特色及研究价值，从文艺民俗学视角出发，以文艺作品中的汉语俗语及其下属类别谚语、歇后语、惯用语为研究对象，全面解读汉语俗语这一结合了语言、文学、文化的特殊形态的立体图像，重点研究汉语



俗语与文艺及民俗文化的相互关系,强调其形象化的文学语言与文化图像的特征。本书通过文艺作品考察汉语俗语与文艺的关联和对文艺创作的积极影响;通过民俗事象展现汉语俗语对汉民族文艺的反映。

文学博士沈玮,本系华东师大对外汉语学院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的硕士生,毕业后从事多年的对外汉语教学和研究,对汉语俗语的文学图像也多有感觉。她攻读文艺民俗学博士学位,从跨学科和学科交叉的视角,审视汉语俗语,有所发现,有所感悟,也有了更深的学理思考,写下这一有新意的博士论文。在获得同行专家教授组成的答辩委员会通过后,她又在原有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推敲修改,使论文的观点、见解更为鲜明突出和富有个性化,全文内容也有扩充,提升到专著的更高层面。学海无涯,钻研无止境。作为俗语文学化图像的率先探索者,总是有着再深入开掘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希望她再接再厉,在不久的将来有进一步的锤炼,为语言学和文艺学的交叉研究作出更大的贡献。

是以为序。

陈勤建

2010年9月6日于寓所



目 录

序	V
绪论 汉语俗语研究综述及相关问题	1
第一节 汉语俗语的研究现状	2
第二节 选题意义与研究方法	12
第一章 汉语俗语的界定与范畴	16
第一节 与俗语相关的概念及其关系	16
第二节 汉语俗语的定義与分类	31
第二章 汉语俗语的文学基因解析	36
第一节 汉语俗语的民间文学本体特性	36
第二节 汉语俗语的文学语言特征	44
第三节 汉语俗语的文学修辞表现	49
第三章 汉语俗语的历史演进与特征	55
第一节 汉语俗语与中国文学作品	55
第二节 汉语俗语与中国戏曲、曲艺	86
第四章 汉语俗语与文艺联姻的基础	98
第一节 汉语俗语进入文艺的合理性	99
第二节 汉语俗语进入文艺的优越性	104



第五章 汉语俗语的语言图像机制	125
第一节 汉语俗语的语言图像性及其特征	125
第二节 汉语俗语图像机制在文学中的表现与作用	133
第六章 汉语俗语文学化的现代嬗变与传承	157
第一节 草根化与“雷人”的网络流行语	158
第二节 图像化与书面文学的视觉追求	163
第三节 狂欢化与“噱头”的海派清口	165
第七章 对外汉语俗语教学	169
第一节 对外汉语俗语教学的现状	169
第二节 对外汉语俗语教学的意义	179
第三节 对外汉语俗语教学的内容	184
第四节 对外汉语俗语教学的方法	187
结 语	198
附录一 QUESTIONNAIRE	200
附录二 1980~2008 部分汉语俗语研究论著与辞书索引	203
附录三 图片来源说明	231
参考文献	235
致 谢	239



绪论 汉语俗语研究综述及相关问题

汉语俗语^①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形态，是世代流传在汉民族口头上的内容广泛、通俗、凝练、鲜活的语言。与文字语言相比，俗语的接受主要靠听觉在头脑中形成图像认识和图像思维，而文字语言的接受主要靠视觉在头脑中形成逻辑思维。由于听觉接受相对于视觉来得慢，因此更加要求语言信息能易听易懂，这样才能迅速地形成反射。汉语俗语将声音与图像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人们听到一句俗语往往就好像看到一幅生动的画面。在日常生活中，俗语形象的表达能带给人们文学化的享受；而在文学作品中，俗语独特的图像性又能使人自然而然地产生艺术上的通感。同时，汉语俗语又建立在特定的文化层次上，具有很强的汉民族民俗文化特征，能反映出不同地域的文化差别。

可以说，俗语是一种由听觉引发出来的，结合了文学图像与民俗因素的立体语言。它不仅反映着汉语的语言特点，也展现着鲜明的文学色彩，并且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汉民族民俗文化信息。它同语言学、民俗学、修辞学、历史学、民族学、文艺学、美学、社会学、人类学，乃至农牧渔林等一些自然科学都有着某种天然的密切联系。可惜的是，这种不可思议的多元性特点不但没有被充分地挖掘出来，反倒成了研究时的劣势。由于汉语俗语的涉及面极宽，而且零散，不成系统，纳入学术话语有一定的难度，以往对汉语俗语的研究多半只停留在纯粹语言学的层面，对其性质的分析和把握就显得较为单一和片面。

因此，本书希望能在拓展汉语俗语的研究领域和理论深度方面作些有益的尝试和探索。首先，让我们来简要回顾一下汉语俗语的研究现状。

^① 为了行文的需要，有时省略“汉语”，只简称“俗语”。



第一节 汉语俗语的研究现状

“俗语”一词，在汉语古文献中最早见于西汉司马迁《史记·滑稽列传》附褚少孙补写的《西门豹治邺》一文：

民人俗语曰：“即不为河伯娶妇，水来漂没，溺其人民”云。

这里的“俗语”一词，是指民间流传的说法。后来，刘向《说苑·贵德》和班固《汉书·路温舒传》引述路温舒写给汉宣帝信中的话语，正式用“俗语”来指称通俗、形象、广泛流行在群众中的定型语句，从此“俗语”一词具有了术语的性质：

故俗语云：“画地作狱，议不可入；刻木为吏，期不可对。”此皆疾吏之风，悲痛之辞也。（《说苑·贵德》）

故俗语云：“画地作狱，议不入；刻木为吏，期不对。”此皆疾吏之风，悲痛之辞也。（《汉书·路温舒传》）

然而，由于对俗语缺乏统一的认识，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俗语被文人雅士们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村言野语，与“里言”、“俚言”、“乡言”、“俗言”、“常言”、“迕言”、“恒言”；“里谚”、“野谚”、“古谚”、“乡谚”、“俗谚”；“里语”、“俚语”、“野语”、“民语”、“常语”、“古语”、“直语”、“鄙语”、“谚语”；“俗话”、“古话”、“炼话”；“常谈”、“俗谈”等多种说法混为一谈，名目繁多。

应该说，古代的俗语研究始终处在一种不自觉的朦胧状态，并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对于当时的研究特点，温端政在《二十世纪的汉语俗语研究》中将之概括为“三重三轻”：重资料辑录轻理论探讨；重考源轻释义；重典籍轻口语。^[1]本书在此就不再进一步展开。

进入20世纪以后，渐渐出现了一些专门讨论俗语的文章，但内容都比较简单，认识也比较模糊，通常是把“俗语”作为“谚语”的通俗名称或者“俚语”的通用名称。如翁祖善等的《俗语分类试案》把俗语分为哲理、社会、自然、应用四大类，其中自然类又分为时令、气象等。^[2]这里说的“俗语”显然就是“谚语”。又如瓊一在《成语、谚语、格言、俗语、俚语的区别》中指出，俗语有两个意义：一个跟谚语的意思相近，一



个跟俚语的意思相近。^[3]胡裕树在1962年主编《现代汉语》一书时,非但没有提及“俗语”,还引进了“熟语”作为包括惯用语、成语、歇后语、谚语、格言等的种概念。^[4]可以说,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里,“俗语”这个名称,从未真正进入汉语语言学的术语体系,更不用说进入其他学科话语体系中了。

一、已有成果总结

由于历史原因,俗语研究在经历了一段停滞期后,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重新起步,此后便迅速发展起来。学者们对俗语的认识越来越精细,研究也越来越深入。不仅确定了俗语在汉语语汇系统中的重要位置,而且俗语研究也作为汉语语言学研究的一个分支独立出来,其研究成果(参见附录二)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

(一) 理论研讨方面

这个时期的俗语研究改变了以往囿囿一体的局面,肯定了俗语是汉语语汇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重点讨论了俗语的性质、范围、分类等基本问题,俗语与谚语、歇后语、惯用语等之间的种属关系,谚语、歇后语、惯用语的性质和范围,俗语的语义和释义方法,以及俗语辞书的编纂和俗语运用的规范化等问题。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专著有:《词汇学研究》(王德春,1983)、《汉语熟语学》(孙维张,1989)、《俗语古今》(屈朴,1991)、《二十世纪的汉语俗语研究》(温端政、周荐,1999)、《俗语》(徐宗才,1999)、《方言与俗语研究》(温端政,2003)、《民俗语言学(增订本)》(曲彦斌,2004)和《俗语研究与探索》(温端政,2005)。

不过,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俗语的性质、范围、分类仍未取得一致意见,综合起来,以下三种认识比较具有代表性。

1. 主张广义理解

认为俗语是与雅言相对,包括谚语、歇后语、惯用语等类别的一类语言单位。持这种主张的学者相对较多,但对于俗语究竟包括哪些下属类别有一些细微的差异。

1979年版《辞海》,把“俗语”解释为“流行于民间的通俗语句,带



有一定的方言性。指谚语、俚语及口头上常用的成语等。”首次明确地用俗语来表示谚语、俚语的上位概念。1989年、1999年版认为俗语还应包括惯用语。

邱崇丙在《俗语五千条》的说明中指出：“俗语，也称常言、俗话，包括谚语、熟语、歇后语三个部分。谚语，是指一些总结知识经验，寓有思想意义的俗语。……熟语，这个术语的定义并不十分明确，本书用来专指描述性的俗语。……歇后语，形式上是半截话，实际上是要把话说得更形象一些。”^[5]

张清常对于俗语的理解也十分宽泛，他在为《常用俗语手册》作序时指出，只要是言词通俗，道理深刻，意思鲜明，形象生动，说得简明扼要，被广大群众广泛使用的语句都是“俗语”，包括了谚语、格言、警句和俚语中成句话的一些说法等等。^[6]

屈朴在《俗语古今》中提出了“俗语品类”的概念，认为“俗语与成语、谚语、格言、歇后语、惯用语、俚语等各俗语品类，是种与属的关系”，是包括口语性成语等俗语品类在内的“定型化或趋向定型化的简练习用语汇和短语”，这“才是汉语俗语总体概念的基本要旨和语态形式的主体成分”。^[7]

温端政在与张书祥合编的《忻州俗语志》前言里就曾经指出：“俗语是一种广泛流传在群众口头上、结构相对固定的通俗语句，它包括俚语、谚语、歇后语、习（惯）用语以及口头上常用的成语等。”^[8]后来，温端政在编写《中国俗语大词典》时又对俗语的性质和范围作了进一步的探讨，稍稍改变了原先的看法，认为俚语大部分是方言词，不应该归入俗语。^[9]之后，在与周荐共同执笔的《二十世纪的汉语俗语研究》一书中，“根据我国传统的观念和汉语语汇结构的实际”，把俗语定义为“流行于民间的通俗语句”，把俗语的范围明确为“包括谚语、歇后语、惯用语和俗成语四项”。^[10]该书及日后温端政主编的《中国俗语大全》（《中国谚语大全》、《中国歇后语大全》、《中国惯用语大全》）和《俗语研究与探索》都是以此这个基本观点为指导来安排内容的。

2. 主张狭义理解

认为俗语既不同于成语，又不同于谚语、歇后语、惯用语等，是与之并列的一类语言单位。有的学者还为俗语等提出了“熟语”这样一个上位



概念。

王德春在《词汇学研究》中也把俗语作为熟语的一小类,把熟语分成成语、谚语、格言与警句、歇后语、俗语与惯用语五类。^[11]

胡朴安的《俗语典》的重印前言也提到“‘熟语’有多种类型,如成语、谚语、格言、俚语、歇后语等。其中流行于民间的通俗语句,常挂在老百姓口头上的,则被称为‘俗语’,也叫做‘常语’”。^[12]

王勤在《俗语的性质和范围——俗语论之一》中对“广义俗语”的说法提出了异议,认为它不符合语言规范化要求,主张把从广义俗语中剔检出成语、谚语、歇后语、惯用语等“名实已定大于词的固定词汇单位”后“剩下的固定词汇材料”称为“狭义俗语”,简称俗语。^[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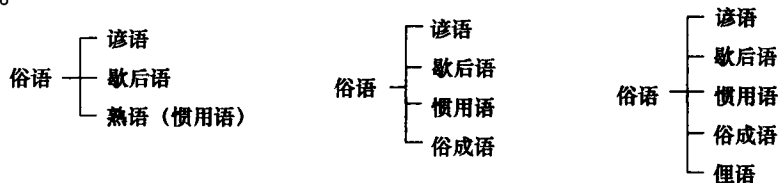
3. 主张两种理解并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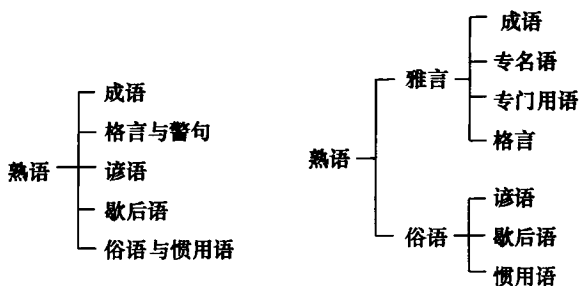
吕洪年的《试论民间俗语》认为,俗语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的俗语是指“流行于民间的一切通俗语句,包括谚语、歇后语及口头上常用的成语、格言、名句、惯用语、俏皮话等”;狭义的俗语是指“谚语、歇后语等并称,除谚语、歇后语之外的来自民间的定型化短语”。^[14]

王捷等编注的《中国俗语》前言里指出,俗语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俗语,包括谚语、歇后语、惯用语,还有俚语、土语方言和通俗成语等,是民间通俗熟语一词的简称或别称;狭义的俗语是通俗而形象地描述人情世态的定型的语句。^[15]

徐宗才在《俗语词典》前言里也指出,“通常对俗语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是广义的,一种是狭义的。广义的俗语包括谚语、歇后语、惯用语、方言俚语等。狭义的俗语是指那些通俗的、形象的定型语句”。徐先生还认为俗语“不同于谚语,也不同于歇后语,它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有交叉”,同时“俗语来源很广,除了人民群众口头创作之外,还有的来自诗文名句、格言警句、历史典故等等”。^[16]

综合各家对俗语的性质的范围的理解,大致可以用下列图示来说明。





这里需要特别介绍的是中国语言学家、民俗学家曲彦斌。他不仅创立了“民俗语言学”这门人文社会科学的新学科，而且在1989年出版的代表这一学科的首部学术专著《民俗语言学》一书中，以新的科学观点和新的研究方法首次将“俗语学”作为表示关于俗语研究这一学科的术语提出。该书从民俗语言学的角度出发，以一个章节的篇幅，对中国俗语学中的俗语与民俗的问题作了一番研究，探讨了俗语的界说及其种类，通过列举相关俗语显示其民俗语言学特点，指出俗语具有传承性、变异性、社会性、历史性、民族性、地方性等民俗的主要特征，并且分析了俗语的交际功用和社会功用。

此外，汉语俗语文化研究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课题。在最近的十年时间里，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和探讨汉语俗语的文化特性和民族气质问题。与这方面内容相关的专著有《汉语熟语与中国人文世界》（崔希亮，1997）、《歇后语与汉文化》（王晓娜，2001）、《民俗文化语汇通论》（谭汝为，2004）、《中西文化与英汉熟语比较研究》（王小凤，2007）等；相关的博士论文有《歌谣俗语与两汉魏晋南北朝社会》（李传军，2005）；硕士论文有《从汉语熟语看中国传统等级观念》（陈楚云，2002）、《与“水”有关的汉泰熟语的意义和文化内涵比较》（李珮玲，2002）、《谚语中的中国古代女性文化透视》（耿静静，2005）、《汉语熟语的文化观照和文化理据》（王岩，2006）、《人名俗语及其文化涵义解构》（李白梅，2006）、《中西谚语在文化层面上的比较》（刘景芳，2006）等；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相关论文有《论熟语的民族气质》（武占坤，1991）、《熟语文化论》（姚锡远，1994）、《汉语熟语的民族性与时代性》（李恕仁，1995）、《谈谈〈西游记〉中成语、俗语的运用与儒家传统》（高思嘉，



1996)、《三国文化熟语探析》(李树新, 2001)、《汉语熟语与传统文化中的处世哲学》(张军, 2001)、《汉语熟语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男性择偶观》(丁艳, 2001)、《从汉语俗语看汉民族的本土文化特征》(钟敏, 2002)、《英汉熟语中的文化现象探讨》(李华, 2002)、《汉语熟语的民族特色研究》(高兵, 2005)、《〈金瓶梅〉中俗语的文化蕴含与明代社会》(郭作飞, 2005)等。

(二) 辞书编纂方面

随着理论研究水平的不断提升, 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的将近30年时间里, 越来越多的学者在收集整理汉语俗语的基础上, 编纂了各类综合性或分类俗语辞书。编者人数不断增多, 编纂规模日渐扩大, 取词分类趋于成熟, 辞书的成批问世为汉语俗语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归纳起来, 俗语辞书的编纂角度可以分为以下几大类。

1. 时代类

此类辞书是从时代角度出发对词汇进行断代研究, 其中都涉及到该时代的俗语。有代表性的是《宋元语言词典》(龙潜庵, 1985)、《魏晋南北朝词语例释》(蔡镜浩, 1990)、《中古汉语语词例释》(王云路等, 1992)、《近代汉语词典》(高文达, 1992)、《唐五代语言词典》(刘坚等, 1997)、《宋代语言词典》(袁宾, 1997)、《元语言词典》(李崇兴等, 1998)、《清代俗语图说》(胡毅华, 2005)。

2. 地域类

此类辞书专从地域角度对俗语进行搜集整理或释义。如《忻州俗语志》(温端政等, 1986)、《平遥方言民俗语汇》(侯精一, 1995)、《省港民间俗语》(庄泽义, 1995, 香港)、《北京俚语俗谚趣谈》(刘建斌, 1999)、《上海俗语图说》(汪仲贤, 1999)、《台湾的俗语话》(林新年, 2002)、《福清俗语》(郭成敏等, 2004)、《闽南谚语俗语格言集萃》(高家凌, 2005)、《重庆方言俚俗语集释》(杨月荣等, 2006)等。

3. 文体类

此类从文体角度出发编纂的俗语辞书又可细分为:



1) 收集小说中的俗语的辞书。如《中国话本小说俗语辞典》和《中国古典小说用语辞典》(田宗尧, 1985, 台北)、《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江蓝生, 1988)、《宋元明清百部小说语词大辞典》(吴士勋等, 1992)、《明清小说词典》(张季皋, 1992)、《中国古代小说俗语大词典》(翟建波, 2002)。

2) 收集诗词曲中的俗语的辞书。如《诗词曲语词例释》(王锬, 1980)、《戏曲词语汇释》(陆澹安, 1981)、《元曲释词》(顾学颉等, 1983)、《诗词曲语辞集释》(王锬等, 1991)、《诗词曲小说语辞大典》(王贵元等, 1993)、《元曲熟语辞典》(刘益国, 1998)。

3) 收集变文中的俗语的辞书。如《敦煌文献语言词典》(蒋礼鸿, 1994)。

4) 收集佛经和禅宗语录中的俗语的辞书。如《禅宗著作词语汇释》(袁宾, 1990)、《佛典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朱庆之, 1992, 台北)、《俗语佛源》(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 1993)。

4. 单一作品类

此类辞书主要集中于对《红楼梦》、《水浒传》、《金瓶梅》、《聊斋志异》、《世说新语》等某部经典文学作品中的俗语的收集、整理及释义。如《〈红楼梦〉俗语概说和汇释》(林兴仁, 1986)、《〈红楼梦〉四字格辞典》(高增良, 1996)、《红楼梦成语词典》(高歌东等, 1997);《水浒词典》(胡竹安, 1989)、《水浒语词词典》(李法白等, 1989);《金瓶梅词典》(王利器, 1988)、《金瓶梅俚语俗谚》(李布青, 1988)、《金瓶梅方言俗语汇释》(李申, 1990)、《金瓶梅词典》(白维国, 1991)、《金瓶梅方俗难词辨释》(刘敬林, 2008);《聊斋志异辞典》(朱一玄等, 1991);《世说新语辞典》(张永言, 1992)、《世说新语词典》(张万起, 1993)。

以上这四类辞书中不乏以收词为主、兼收俗语的, 但同样为俗语的全面搜集整理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5. 综合类

比较有代表性的综合性俗语辞书有:《常用俗语手册》(徐宗才等, 1985)、《中国俗语选释》(曹聪孙, 1985)、《古今俗语集成》(温端政, 1989)、《中国俗语大辞典》(温端政, 1989)、《中国俗语典》(曹聪孙, 1991)、《中国俗语》(王捷等, 1992)、《俗语词典》(徐宗才等, 1994)、



《语海》(何承伟, 2000)。

除综合性俗语辞书外, 谚语、歇后语、惯用语等分类俗语辞书更是层出不穷。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汉语谚语小词典》(温端政, 1989)、《中华谚语大辞典》(耿文辉, 1991)、《中国谚语集成》(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 17卷, 1992~2004);《古今歇后语选释》(宁策, 1982)、《歇后语词典》(温端政等, 1984)、《歇后语大全》(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资料室和北京大学中文系资料室, 1987)、《中国歇后语》(孙治平等, 1988);《惯用语例释》(徐宗才等, 1985)、《中国惯用语》(陈光磊, 1991)、《汉语惯用语大词典》(高歌东等, 1995)。

2002年, 温端政先生主持的“汉语俗语语料的计算机处理与相关语言学问题研究”课题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2004年5月, 该项目的阶段成果“中国俗语大全”(包括《中国谚语大全》、《中国歇后语大全》、《中国惯用语大全》)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标志着俗语辞书的编纂、出版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此外, 港台地区的学者在汉语俗语的收集整理和辞书的出版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如《中国古典小说用语辞典》和《中国话本小说俗语辞典》(田宗尧, 1985, 台北)、《中国俗语大典》(刘运宇, 1986, 台北)、《中华谚语志》(朱介凡, 1989, 台北)、《歇后语与俏皮话》、《中国俗语与谚语》和《中国谚语选辑》(管梅芬, 1993, 台北)、《台湾民俗谚语析赏探源》(吕自扬, 1994, 高雄)、《省港民间俗语》(庄泽义, 1995, 香港)。

对汉语俗语表现出浓厚兴趣的外国学者主要来自同属汉字文化圈的周边国家。在日本、韩国、新加坡都有俗语类工具书出版, 如《歇后语汇编——中国的谐谑语》(川濑正三, 1969, 东京)、《中国歇后语的研究》(服部隆造等, 1975, 东京)、《中国的俗谚》(田中清一郎, 1979, 东京)、《明清俗语辞书集成》(长泽规矩也, 1989)、《中国歇后语300》(香板顺一等, 1995, 东京)、《中国俗语辞典》(中国俗语辞典刊行会, 1992, 汉城)、《中国常用俗谈凡例》(吴庆第, 1992, 釜山)、《常用成语、谚语小辞典》(胜利书局, 1986, 新加坡)。

总之, 近30年来, 学者们拓展了俗语研究的范围, 加大了研究的力度, 提高了研究的水平, 无论是在理论研究方面还是在辞书编纂方面都获得了比较丰富的成果。

